

曾巩研究

李俊标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曾巩研究

李俊标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曾巩研究/李俊标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12

ISBN 978-7-5161-0391-3

I. 曾… II. 李… III. 曾巩(1019~1083)—人物研究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59783号

责任编辑 曲弘梅

责任校对 何又光

封面设计 毛国宣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人	赵剑英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39570(编辑) 64058741(宣传) 64070619(网站) 010-64030272(批发) 64046282(团购) 84029450(零售)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6.75	插 页	2
字 数	429千字		
定 价	52.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敬以此書獻給母親大人

張桂英女士

在创新语境中努力引领先锋学术

(总序)

任 平

沐浴着 2011 年的春风,《徐州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文库》终于出场,我由衷地感到高兴,并祈盼它作为徐州师范大学学术的创新之声。任何真正的创新学术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的活的灵魂。大学是传承文明、创新思想、引领社会的文化先锋,徐州师范大学更肩负着培育大批“学高身正”的师德精英的重任,因此,植根于逾两千年悠久历史的两汉文化沃土,在全球化思想撞击、文明对话的语境中,与科学发展的创新时代同行,我们的人文学科应当是高端的,我们的学者应当是优秀的,我们的学术视阈应当是先锋的,我们的研究成果应当是创新的。作为这一切综合结果的文化表达,本文库每年择精品力作数种而成集出版,更应当具有独特的学术风格和高端的学术品位,有用理论穿透时代、思想表达人生的大境界和大情怀。

我真诚地希望本文库能够成为徐州师范大学底蕴深厚、学养深沉的人文传统的学术象征。徐州师范大学是苏北大地上第一所本科大学,文理兼融,文尤见长。学校 1956 年创始于江苏无锡,1958 年迁址徐州,1959 年招收本科生,为苏北大地最高学府。20 世纪 60 年代初,全国高校布局调整,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指示:“徐州地区地域辽阔,要有大学。”学校不仅因此得以保留,而且以此为强大的精神动力而得到了迅速发展。在 50 多年的办学历史上,学校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先后涌现出著名的汉语言学家廖序东教授,著名诗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吴奔星教授,戏剧家、中国古代文学史家王进珊教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专家吴汝煜教授,教育家刘百川教授,心理

* 任平,徐州师范大学校长。

2 在创新语境中努力引领先锋学术(总序)

学家张焕庭教授,历史学家臧云浦教授等一批国内外知名的人文学者。50多年来,全校师生秉承先辈们创立的“崇德厚学,励志敦行”的校训,发扬“厚重笃实,艰苦创业”的校园精神,经过不懈努力,徐州师范大学成为江苏省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作为全国首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全国首批有资格接收外国留学生的高校,目前有66个本科专业,覆盖十大学科门类。有18个一级学科硕士点和119个二级学科硕士点,并具有教育、体育、对外汉语、翻译等5个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和以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授予权,列入江苏省博士学位建设单位。拥有两个省优势学科和9个重点学科。语言研究所、淮海发展研究院、汉文化研究院等成为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已经筹建以文化创意为特色的省级大学科技园;主持包括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重点项目在内的一批国家级项目,获得教育部和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多项。拥有院士、长江学者、千人计划、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在内的一批高端人才。现有在校研究生近2800人,普通全日制本科生26000余人。学校与美国、英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20余所高校建立了校际友好合作关系,以举办国际课程实验班和互认学分等方式开展中外合作办学,接收17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来校学习。学校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建立了两个孔子学院。半个世纪以来,学校已向社会输送了十万余名毕业生,一大批做出突出成就的徐州师范大学校友活跃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今日徐州师范大学呈现人文学科、社会学科交相辉映,基础研究、文化产业双向繁荣的良好格局。扎根于这一文化沃土,本着推出理论精品、塑造学术品牌的精神,文库将在多层次、多向度上集中体现和反映学校的人文精神与学术成就,展示师大学者风采。本文库的宗旨之一:既是我校学者研究成果自然表达的平台,更是读者理解我校学科和学术状况的一个重要窗口。

努力与时代同行、穿透时代问题、表征时代情感、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本文库选编的基本努力方向。大学不仅需要文化传承,更需要创新学术,用心灵感悟现实,用思想击中时代。任何思想都应当成为时代的思想,任何学术都应当寻找自己时代的出场语境。我们的时代是全球资本、科技、经济和文化激烈竞争的时代,是我国大力实施科学发展、创新发展、走向中国新现代化的时代,更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推动更加公正、生态与安全的全球秩序建立和完善的时代。从工业资本为主导向以知识资本为主

导——新旧全球化时代历史图景的大转换需要我们去进行深度描述和理论反思；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遭遇时空倒错，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共时出场，因而中国现代性命运既不同于欧美和本土“五四”时期的经典现代性，也不同于后现代，甚至不同于吉登斯、贝克和哈贝马斯所说的西方（反思）的新现代性，而是中国的新现代性。在这一阶段，中国模式的新阶段新特征就不同于“华盛顿共识”、“欧洲共识”甚至“圣地亚哥共识”，而是以科学发展、创新发展、生态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为主要特征的新发展道路。深度阐释这一道路、这一模式的世界意义，需要整个世界学界共同努力，当然需要本土大学的学者的加倍努力。中国正站在历史的大转折点上，向前追溯，五千年中国史、百余年近现代史、六十余年共和国史和三十余年改革开放史的无数经验教训需要再总结、再反思；深析社会，多元利益、差异社会、种种矛盾需要我们去科学把握；未来展望，有众多前景和蓝图需要我们有选择地绘就。历史、当代、未来将多维地展开我们的研究思绪、批判地反思各种问题，建设性地提出若干创新理论和方案，本文库无疑应当成为当代人的文化智库、未来人的精神家园。

我也希望：文库在全球文明对话、思想撞击的开放语境中努力成为创新学术的平台。开放的中国不仅让物象的世界走进中国、物象的中国走向世界，而且也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宽阔胸襟让文化的世界走进中国，让中国精神走向世界。今天，在新全球化时代，在新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强力推动下，全球核心竞争领域已经逐步从物质生产力的角逐渐次转向文化力的比拼。民族的文化精神与核心价值从竞争的边缘走向中心。发现、培育和完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优秀的思想观念、文化精神和价值体系，成为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自立、自强、自为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路径和精神保障。文化力是一种软实力，更是一种持久影响世界的力量和权力。本文库弘扬的中国汉代精神与文化，就是培育、弘扬这种有深厚民族文化底蕴、对世界有巨大穿透力和影响力的本土文化。

新全球化具有“全球结构的本土化（glaocalization）”效应。就全球来看，发展模式、道路始终与一种精神文化内在关联。昨天的发展模式必然在今天展现出它的文化价值维度，而今天的文化价值体系必然成为明天的发展模式。因此，发展模式的博弈和比拼，说到底就必然包含着价值取向的对话和思想的撞击。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出现了三种发展模式，分别发

生在拉美国家、俄罗斯与中国,具体的道路均不相同,结果也大不一样。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就是新自由主义价值观支撑下的发展模式,它给拉美和俄罗斯的改革带来了严重后果,替代性发展价值观层出不穷。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更证明了这一模式的破产。1998年4月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明确提出了以“圣地亚哥共识”替代“华盛顿共识”的主张。但是“拉美社会主义”至今依然还没有把南美洲从“拉美陷阱”中完全拔出。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理论出发的“欧洲价值观”,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倡导人权、环保、社会保障和公平分配,但是这一价值并没有成为抵御全球金融危机的有效防火墙。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形成“中国模式”,堪称很好的经济学教材^①。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乔舒亚·库珀·拉莫(Joshua Cooper Ramo)在2004年5月发表的论文中,把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概括为“北京共识”。通过这种发展模式,人们看到了中国崛起的力量源泉^②。不管后金融危机时代作为“G2”之一的中国如何,人们不可否认“中国经验”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新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必然包含着中华民族自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合发展的共同体主义。而它的文化脉络和源泉,就是“中国精神”这一理想境界和精神价值,与努力创造自己风范的汉文化精神有着不解之缘。文库陆续推出的相关著作,将在认真挖掘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与各种文化对话中努力秉持一种影响全球的文化力,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增添一个窗口。

文库也是扶持青年学者成长的阶梯。出版专著是一个青年人文学者学术思想出场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他学问人生的主要符码。学者与著作,不仅是作者与作品、思想与文本的关系,而且是有机互动、相互造就的关系。学者不是天生的,都有一个学术思想成长的过程。而在成长过程中,都得到过来自许许多多资助出版作品机构的支持、鼓励、帮助甚至提携和推崇。“一举成名天下知”。大学培育自己的青年理论团队,打造学术创新平台,需要有这样一种文库。从我的学术人生经历可以体会:每个青年深铭于心、没齿

① 《香港商报》2003年9月18日。

② 《参考消息》2004年6月10日。

难忘的，肯定是当年那些敢于提携后学、热荐新人，出版作为一个稚嫩学子无名小辈处女作的著作的出版社和文库；慧眼识才，资助出版奠定青年学者一生学术路向的成名作，以及具有前沿学术眼光，发表能够影响甚至引领学界学术发展创新之作。我相信，文库应当热情地帮助那些读书种子破土发芽，细心地呵护他们茁壮成长，极力地推崇他们长成参天大树。文库不断发力助威，在他们的学问人生中，成为学术成长的人梯，学人贴心的圣坛，学者心中的精神家园。

是为序。

2011年2月28日

前 言

丹阳朱熹曰：予读曾氏书，未尝不掩卷废书而叹，何世之知公浅也！盖公之文高矣，自孟、韩子以来，作者之盛未有至于斯。夫其所以重于世者，岂苟而云哉！然世或徒以是知之，故知之浅也。知之浅，则于公之事论之犹不能无所牴牾，而况于公之所以为书者，宜其未有以知之也。然则世之自以知公者，非浅而妄与？其可叹也已。^①

这是朱熹为曾巩所编年谱而作的前序，文中朱熹反复感叹世人知公之浅，徒以其“文高”而相誉，这也就是他在年谱后序中所说的“岂非徒以其名欤”之“文名”^②。显然，朱熹自以为其对曾巩可谓知之深。此知之深源于其爱之切，一代通儒朱夫子对于曾巩的喜爱乃有宋诸大家所罕有之殊荣。由爱之切更进而护之急，故欲编撰年谱以消除世人之浅知与抵牾，发扬其对曾巩之真知。而此真知即在于“公之所以为书者”。此可分为两说，一者就其文思言，可谓“议论平正”、“词严理正”；二者就其行文言，可谓“做文字依傍道理做，不为空言”^③。这两者都深为朱熹所称颂，故而“年二十许时，便喜读南丰先生之文”^④。

与此文思相反的即是朱熹所批评的，如指韩愈“生平意向之所在，终不免文士浮华放浪之习”，责老苏“自家意思都不正当”，斥大苏“议论有不

① 《朱熹集·朱熹外集》卷2《南丰先生年谱序》，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759页。

② 《朱熹集·朱熹外集》卷2《南丰先生年谱后序》，第5760页。

③ 见《朱子语类》卷130，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117页；《朱熹集》卷83《跋曾南丰帖》，第4281页；《朱子语类》卷139，第3313—3314页。

④ 《朱熹集》卷84《跋曾南丰帖》，第4338页。

正当处”^①。这也就是他所总结的：“大概皆以文人自立。平时读书，只把做考究古今治乱兴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以吟诗饮酒戏谑度日。”^②而曾巩与众文士一大不同处正是这与其“平正”、“理正”文思一以贯之的“性谨严”、“刚毅直方”的“身上工夫”。在曾巩身上很难找到“放浪”、“戏谑”的痕迹，这些都与其性格格格不入，以至明代茅坤说他少了些“逸调”，“殊属木讷蹇涩”^③。王文禄则直言其“木笃而欠玲珑”^④。清代风流倜傥的袁枚更是断言他“天性少情”^⑤。此种践履实行工夫，为理学家所独擅，“宋儒崛起，一矫汉、唐以后重文轻行之失”^⑥，故而其尤为朱熹所喜。

与此行文相左的即是朱熹所反对的“文自文而道自道”，“道外有物，固不足以为道”^⑦。文道关系由“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揭橥大义，随后柳宗元“文者以明道”、李汉“文者贯道之器”相与鼓动。迨递至宋初，柳开以“文章为道之筌”遥相呼应，后接以石介“（文）本于教化仁义”、周敦颐“文所以载道”，至程颐发以“作文害道”之惊人语。南宋朱熹集大成，以为“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曾巩的文章始终拳拳于道德人心，绝少支衍涣漫处，尤其是其严谨的“身上工夫”，故而使其文俨然是“从道中流出”。而朱熹以为苏轼等人则是“待作文时，旋去讨个道来入放里面”^⑧，这就使得文生道外，以至文可肆无忌惮。虽然朱熹也强调曾巩“只是学为文，却因学文渐见些子道理”，“见处不彻，并无根部工夫”^⑨。但就其对宋代文学创作诸大家的评论而言，仍然是认为“固宜以欧、曾文字为正”，以为“文字

① 见《朱熹集》卷67《杂著·王氏续经说》，第3547页；《朱子语类》，第3311页；《朱子语类》，第3309页。

② 《朱子语类》卷130，第3113页。

③ 见（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论例》，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茅坤集》卷8《复陈五岳方伯书》，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61页。

④ （明）王文禄《文脉》卷2《文脉杂论》，《百陵学山》本，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七年。《学海类编》本此句作“本笃而欠玲珑”，《百陵学山》为王文禄所辑，当以之为是，《学海类编》误。（上海涵芬楼据六安晁氏稟珍版影印，1920年。）

⑤ 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三册《随园诗话》卷6，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页。

⑥ 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11集《本朝学术源流概略》第1章《古今学术之递变》，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93页。

⑦ 见《朱子语类》卷139，第3319页；《朱熹集》卷30《与汪尚书》，第1277—1278页。

⑧ 《朱子语类》卷139，第3319页。

⑨ 同上书，第3313—3314页。

到欧曾，道理到二程，方是畅”。而对于欧、曾，则是“欧公文字大纲好处多，晚年笔力亦衰。曾南丰议论平正，耐点检”。尽管其又言：“曾所以不及欧处，是纾徐曲折处。”但即使与欧公这一长处相较，朱熹仍然多爱曾巩，“欧公文字敷腴温润，曾南丰文字又更峻洁，虽议论有浅近处，然却平正好”。就思想深度而言，集大成的朱夫子自然远非曾巩所能及，免不了要“见处不彻”；然而就有宋文坛诸大家而言，其思想之纯正则远过他人，文行合一相得益彰，朱熹于天水士林之中独喜曾巩也自在情理之中。况且这种批评多少也如钱穆所言：“朱子深爱南丰文，其评鹭之严，亦可见其持道之正而坚。”^①

曾巩身前由知之浅而“不能无所牴牾”之事，大概莫过于“避兄而舍”、“三不如”与“不能作诗”了。前两者涉及德行，后者有关艺文，就“三不朽”而言，前者尤重，涉及曾巩为人行事之道德操守。

“避兄而舍”见于王安石《答段缝书》：

惠书以所闻诋巩行无纤完，其居家，亲友耄耋焉，怪安石无以文字规巩，见谓有党。果哉，足下之言也。巩固不然。巩文学论议，在安石交游中不见可敌。其心勇于适道，殆不可以刑祸利禄动也。父在困厄中，左右就养无亏行，家事铢发以上皆亲之。父亦爱之甚，尝曰：“吾宗敝，所赖者此儿耳。”此安石之所见也。若足下所闻，非某之所见也。巩在京师，避兄而舍，此虽某亦罪之也，宜足下深攻之也。于罪之中，有足矜者，顾不可以书传也。事固有迹，然而情不至是者，如不循其情而诛焉，则谁不可诛邪？巩之迹固然邪？然巩为人弟，于此不得无过。……凡巩之行，如前之云。其既往之过，亦如前之云而已，岂不得为贤者哉？天下愚者众而贤者希，愚者固忌贤者，贤者又自守，不与愚者合，愚者加怨焉。挟忌怨之心，则无之焉而不谤，君子之过于听者，又传而广之，故贤者常多谤，其困于下者尤甚。势不足以动俗，名实未加于民，愚者易以谤，谤易以传也。凡道巩之云云者，固忌、固怨、固过于听者也。家兄未尝亲巩也，顾亦过于听耳。足下乃欲引忌者、怨者、过于听者之言，县断贤者之是非，甚不然也。^②

① 《钱宾四先生全集·朱子新学案》六之二《朱子之文学》，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185页。

② （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华正书局1975年版，第796—797页。

此流议传播颇广，多年后朱熹也曾言：“南丰与兄，看来是不足。观其兄与欧公帖可见。”^① 段缝此议并非仅仅一亲友关系问题，实质是指责曾巩不堪“齐家”之德。而“齐家”乃儒学人伦立命之本，于此大亏则何以“治国”？由此可至百无一一是，诚如朱子所谓：“一有不至，则余无足观。”^② 故而论题虽小，旨趣实大。王安石亦针锋相对，着重就“齐家”中最为紧要之孝道展开论述。以为其父困厄之际，幸有曾巩左右周旋，令其父大为宽心。除此外王安石之亲见，其他史料也能予以佐证。曾肇在为其兄所作《行状》中亦言：“初，光禄仕不遂而归，无田以食，无屋以居，公时尚少，皇皇四方，营饘粥之养。”其父失官赋闲乡里十二年之间，著《时议》数十万言。晚年心有不甘，欲赴京师将之献于朝廷，一路陪行者即是曾巩，可见其父子亲情。最终曾易占病逝于南京，丧事之料理、灵柩之南归全靠曾巩一人奔走操劳，其间艰辛具见《谢杜相公书》。曾巩一家兄弟姊妹众多，日常生活也多为其一手经营。《曾巩行状》中曾肇就曾满怀深情地倾诉道：“光禄不幸蚤世，太夫人在堂，阖门待哺者数十口，太夫人以勤俭经理其内，而教养四弟，相继得禄仕，嫁九妹皆以时，且得所归，自委废单弱之中，振起而亢大之，实公是赖。”可见曾巩确是上孝下悌。曾巩唯有一家兄曾晬，皇祐五年试进士不第，归途得疾卒于江州，年四十五岁。曾巩为其写有《亡兄墓志铭》，高度赞扬其博学多能，并对其不得志而早逝深表惋惜。《宋元学案补遗》亦将之列入“博士家学”之中^③。“避兄而居”是指曾晬还是其他族兄，不得而知。不过从王安石的表述中可以看出，此事虽然是“不得无过”，但“有足矜者”，无伤“贤者”之名，本不足以大惊小怪。然有人偏要纠缠于此，甚至更引申出“其居家，亲友惴畏”之论，由此王安石甚为愤慨，作贤、愚之辩，指斥此议不过是“固忌、固怨、固过于听者”之所为。与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司马光在《日录》中对曾氏父子二人的丑诋。以为曾易占坐赃被发配英州，逃匿后又被纠劾，终是贬死于谪所。曾巩则不奔丧，为乡议所贬。又言：“子固及第，乡人作感皇恩道场，以为去害也。子固好依漕势以陵州，依州陵县，依县陵民。”^④ 上述所记均与史

① 《朱子语类》卷130，第3106页。

② （宋）朱熹：《论语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8页。

③ （清）王梓材、冯云濠：《宋元学案补遗》，丛书集成续编第32册，据《四明丛书》影印，上海书店1994年版，第723页。

④ （宋）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九之一，《四部丛刊初编》本。又见李裕民校注《司马光日记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6页。

事严重相悖，朱熹以为是“温公传闻之误也”。然而著有《通鉴考异》向以谨严著称的史学名家司马光何以关涉曾巩之史事却一错再错，且非如“不能作诗”之论尚可捕风捉影^①，此处所记于其他史籍罕有记载。此当非偶一失误，如此歪曲事实想必是因曾巩其弟是曾布、其友乃王安石所致。

“三不如”之论出自吕公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十四记载：

（元丰四年七月）巩所为文，章句非一律，虽开阖驰骋，应用不穷，然言近指远，要其归必止于仁义。至其行，不能逮其文也。吕公著常评巩，以为为人不及论议，论议不及文章。^②

对此李焘注曰：

田画作《王安礼行状》云：曾巩以文学称天下，在熙宁、元丰间，龃龉不用。王安礼荐于上，曰：“巩之词采足传于后，今老矣，愿俾修文当代，成一家言。”上曰：“公著尝谓巩行义不及政事，政事不逮文学。果然，无足为者。”安礼曰：“诚如其言，请取其最上者。”上乃用巩为史官。

可见，李焘颇以吕公著所言为是。并补充田画所记，以为曾巩充史馆修撰，乃王安礼相助，仅取其最优者而为之。自李焘记载之后，《宋史·曾巩列传》也照此在曾巩本传最后附带上一句：“吕公著尝告神宗，以巩为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云。”^③然而《宋史》此笔颇耐人寻味。传记前文历数其为官各地均是政绩卓著，最终以为“巩负才名，久外徙，世颇谓偃蹇不偶”，并引神宗所言：“世之言理财者，未有及此。”此可谓其“政事”。传记后文记载其德行：“巩性孝友，父亡，奉继母益至，抚四弟、九妹于委废单弱之中，宦学昏嫁，一出其力。”此可谓其“行义”。行文至此突然接入吕公著所言，前后极为突兀。显然可见《宋史》编撰者对此语之否定态度，“以是不大用”甚有为其一生之“偃蹇不偶”诉冤之意。

① 有关“不能作诗”论之原委，参见正文“曾巩‘不能作诗’论溯源”一章。

②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609—7610页。

③ 《宋史》卷319，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392页。

至清中叶，王文诰于《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中则直接辩说道：

史又云：“吕公著尝告神宗，巩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若如其说，则凡当日大小臣工史不载者，皆当出巩之上，而何以史家立传诸人，其行义、政事、文章不及巩者多耶？神宗素不喜巩文章，公著特为此语中之，故其视巩行义、政事为尤可吐弃，而因以流落不偶。夫以巩之行义、政事、文章，卓然可见，人所信尚者，公著尚谗之如此，则如伊川、明道之学，当日天下之所惊疑而未尽信者，宜其激怒太皇，立时逐去也。迹其设心之毒，与其父夷简之逐范仲淹、孔道辅一辙。然夷简恣行奸利，尚不自讳，而公著则深中多数，不可测识，且以巩与其弟布并论。人皆知巩之贤而布之奸矣，公著何不亦一言去之，而竟以貽祸国家，究其是非之颠倒，虽公著亦不能自解也。^①

王文诰愤激之余，未细辨《宋史》之真意，所举例也多有牵强不当之处。吕公著之所以有此一语，想必也与其好友司马光相同，多是党争惹的祸。与司马光相比，他已经是相当客气了。

曾巩多遭忌恨的因由，除了党争之外，上文所引王安石所论以为是贤、愚有别，而被愚者中伤。另外，庆历五年所作《答曾子固南丰道中所寄》也有同调：“吾子命世豪，术学穷无间。直意慕圣人，不问闵与颜。彼昏何为者，诬构来嘏嘏。”^②除了王安石，曾肇《曾巩行状》所载神宗对他的评价“以卿才学，宜为众所忌也”，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曾巩多遭忌恨还与其个性多有关联。曾氏家族几代人性格似都过于耿硬，相应的脾气也都不大好。《东都事略》说曾巩的祖父曾致尧“性刚率”、“词多激讦”，而《宋史》本传更不客气地批其“词旨狂躁”^③。曾巩四弟曾肇，也是“刚大之气见于颜面，望之不可犯”^④。至于三弟曾布，置身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更是个犟脾气。《东都事略》卷九五《曾布列传》记载王

① 《苏轼诗集》卷6《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44—245页。

② 《王荆文公诗李壁注》卷20，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968页。

③ 见《东都事略》，《宋史资料萃编》第一辑，文海出版社1979年版，第716页；《宋史》卷441，第13051页。

④ 《曲阜集·神道碑》，《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安石曾言：“法之初行，异论纷纷，始终以为可行者，吕惠卿、曾布也。”^①曾巩的性格也是如此，“性谨严”、“刚毅直方”之类描叙屡见于史籍。宋人王铨所作《默记》曾记载：“曾子固作中书舍人还朝，自恃前辈，轻蔑士大夫。”^②此语或因党见而有夸大之嫌。而曾巩在《与王介甫第三书》中曾自言“然今天下同志者不过三数人尔”，以至如《明州谢到任表》所言：“眇是羈单，了无党助。”这一性格在与王安石的交往中表现得尤为分明。早年两人志同道合、惺惺相惜，加之姻亲之谊，可谓流水知音。曾巩“自得介卿……思而不释”，王安石“吾少莫与合，爱我君为最”^③。然而对于如此挚友，因政见之不合，曾巩依然是毫不避讳一再进言劝诫。如嘉祐三年《与王介甫第二书》：“按致操切之法用，而怨忿违倍之情生；偏听摘抉之势行，而潜诉告讦之害集。”熙宁元年王安石由江宁被召入政府，越次入对，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变法已箭在弦上。此年曾巩劝诫之书陡增，作有《过介甫归偶成》：“直道诟非难，尽言竟多违”；《过介甫》：“颇谙肺腑尽，不闻可否言”；《秋日感事示介甫》：“生民苦未息，吾党耻论兵”。王安石为翰林学士请坐讲，曾巩亦著《讲官议》予以反驳。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被任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曾巩也随即离开中央，出为越州通判，由此开始了他长达十二年的外放生涯，王安石执政期间再未任职中央。熙宁九年冬十月王安石去位以后，曾巩始于元丰三年回归政府。当神宗因其与王安石为布衣之旧而召问安石之为人时，曾巩直言以对：“安石文学行义，不减扬雄，然吝，所以不及古人。”神宗又言：“安石轻富贵，非吝也。”曾巩对曰：“非此之谓。安于有为，吝于改过。”^④此语极易令人揣度两人关系晚来交恶，如李壁于《寄曾子固》诗下注言：“公集有《同学一首别子固》，子固作《怀友》一篇遗公，可见其相爱也。晚年乃方相违尔。”^⑤然而此时曾巩仍然一再寄书给远在江宁的王安石，告以少习“异学”，以儒道谆谆相劝^⑥。可见两人友

① 《东都事略》，第1473页。

② （宋）王铨撰，朱杰人点校：《默记》，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页。

③ 见《曾巩集》卷52《怀友一首寄介卿》，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22页；《王荆文公诗李壁注》卷17《寄曾子固》，第900页。

④ 《后山先生集》卷24《谈丛四》，《宋集珍本丛刊》第29册，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32页上一下，明弘治十二年刻，傅增湘校本。

⑤ 《王荆文公诗李壁注》卷20，第900页。

⑥ （宋）王安石撰：《临川先生文集》卷73《答曾子固书》，《四部丛刊初编》本。

情仍在，并非相忘于江湖。只是彼此政见不同，加之性格过拧不能迁就，故而再难有同道之喜了。由早年“怀思切劘效，中夜泪滂沛。……宵床连衾峙，昼食共粗粝”到而今“悠悠谁可语”，百般况味也唯有两人对月怅怀矣。《宋史·曾巩传》在“世颇谓偃蹇”之后加“不偶”二字，虽是指其怀才不遇，但其一生确也是因性格之“不偶”而多遭“偃蹇”。

曾巩耿介的秉性并非都只带来“偃蹇”，也促成了他对儒道的执意恪守，使其始终“不肯放倒自家面目”^①，这在“禅学始兴，趋之者如水走下”的宋代颇为难能^②，尤其于宋代文坛一片梵音呗颂之中越发显得卓然而立。其更能由爱之切而悟之深，儒思转多新变，成为宋初新儒学的一脉涓流。早在曾巩初入仕途为太平州司法参军时，世人即“以公为曾夫子，必无所不学也”^③。后于熙宁年间齐州任上，时号“铁面御史”的赵抃曾赋《寄酬齐州曾巩学士二首》相赠^④，赞其“而今天子用真儒”^⑤。有宋大才黄庭坚向以“我不为牛后人”而自视极高，也曾将“大儒”之美誉赋予曾巩^⑥。南宋大儒黄震，“所造博大精深，徽公瓣香为之重振”^⑦，于《黄氏日钞》中亦称许曾巩为“大贤”。到了元代，一代名儒刘埙、虞集更将其誉为理学之先声^⑧。明代接以何乔新、罗汝芳、艾南英、邵廉、甯瑞鲤、王玺等人相与赓和。至清初，世祖福临御制《内则衍义》十六卷、《孝经注》一卷，其子圣祖玄烨更扩为《孝经衍义》一百卷，又御纂《性理精义》、《朱子全书》，世宗胤禛

① 茅坤评语，见高海夫主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南丰文钞·鹅湖院佛殿记》，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第4091页。

② 《曲阜集》卷三《滁州龙蟠山寿圣寺佛殿记》。

③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0，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01页。

④ 《宋史》卷316，第10322页。

⑤ （宋）赵抃：《清献集》卷5《寄酬齐州曾巩学士二首》之二，《宋集珍本丛刊》第6册，第742页下，据明汪旦嘉靖四十一年刻本影印。

⑥ （宋）胡仔：《茗溪渔隐丛话·前集》卷5引黄庭坚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⑦ 《黄宗羲全集》第六册，《宋元学案》卷86，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96页。

⑧ （元）刘埙：《隐居通议》卷1《古人自少力学》：“且是时濂洛未兴，而先生之学专向圣域，何可得哉？”《隐居通议》卷14《南丰先生学问》：“濂洛诸儒未出之先，杨、刘昆体固不足道。欧、苏一变，文始趋古。其论君道、国政、民情、兵略，无不造妙。然以理学，或未之及也。当是时，独南丰先生曾文定公，议论文章，根据性理。……此朱文公评文，专以南丰为法，盖以其于周、程之先，首明理学也。”（《丛书集成新编》第8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388、424页，据《读斋丛书》本排印）

（元）虞集撰，王颀点校：《虞集全集·庐陵刘桂隐存稿序》：“南丰曾子固博考经传，知道修己，伊洛之学未显于世，而道说古今，反覆世变，已不失其正，亦孰能及之哉？”（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01页）